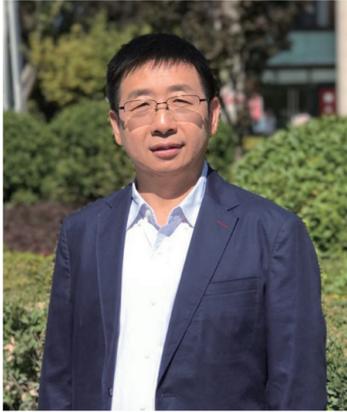


学术出版的快与慢

□陈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家专业的学术出版社，回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个人觉得它发展得不快也不慢。说不快，是因为它至今以学术出版为主业，专而精的宗旨没什么变化，说不慢，是因为其出版规模近十几年也翻了几番。特别是在社长赵剑英的领导下，出版社在学术出版的快慢节奏上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一历程可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赵剑英著的《思想的表达与传播——学术出版的本质及其实践》得以诠释。赵剑英社长把学术出版的初心和使命定义为“传文明薪火，发时代先声，以及做优秀思想的耕耘者、集聚者和传播者”，这也是他作为掌门人对社科出版社近十几年来实践的总结。

人们总觉得谈发展，快就是好的，慢似乎要被鞭打，其实只有掌握好快慢节奏才是对的。社科出版社以学术出版为基业，长久以来特色鲜明，不管是在出版业求量之扩大的急速发展时期，还是在如今慢下来求质的提升的阶段，它们表现得快慢有度。这首先表现在编辑队伍的配置和主业分工上，适应了快慢的需要。社科出版社的编辑队伍大致有两部分，一支常规大军，那就是各专业出版中心，另一支是快速反应部队，号称“重大项目出版中心”。相对而言，总体上前者侧重各学科学术成果的出版，出书节奏慢些，后者侧重主题图书、智库图书等，出书要求较快。像“剑桥中国史”系列、“剑桥世界史”系列、“剑桥哲学史”系列、“剑桥基督教史”系列，“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20册），《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9卷）等都是由常规军多年经营慢慢积累的学术精品书，而像《改革开放简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1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书系”、“国家智库报告系列”等则是由快速反应部队从策划、组织到出版，集合众力精心打造的主题图书，总体说，二者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一个靓丽的学术精品阵营。

社科出版社以学术出版为主业，但也面临国内出

版界同行的挑战。因为学术出版现已成为综合性出版社及大学出版社的重要板块，必争之地，而且还有同样以学术出版为基业的专业出版社同行的竞争。如果慢了，就抢不到好的选题，但如果快了，又面临质量的压力。竞争靠的是品牌、效率和编辑功夫，出版周期的把控，最重要的还是要保证出版质量，最后的话语权在作者和市场。如一本单册图书，快有3个月内赶出的作品，慢有超过一年以上出版周期或更长的，有的是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的精心细作，有的则是一个团队的日夜奋战，不论快慢，都坚持三审三校层层把关，这样做的后盾则是我们除了有专业齐全的编辑队伍外，还有30多人的校对和质检队伍。近些年我们每年出版新书超1800种，正代表了社科人的出版速度，既基本满足了作者要求的“快”，也坚持了出版社环节和质量保证的“慢”。

社科出版社没有教材教辅图书，过去党政类、主题类图书也很少。近十年来出版社主题图书板块迅速成长起来。这不仅是党和国家出版事业的需要，也是出版业发展的一大机遇，对社科出版社来说，更是一次扩大出版阵地、丰富出版品牌、扩大品牌和学术影响力的绝佳机会。主题图书板块有其鲜明特色，那就是其学术性和学术品质。“理解中国”丛书、“中国制度研究”丛书，《新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年编》都属于这一快速出版、快速成长的主题板块，其中不仅培育出获奖重点书，如《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12册）》荣获政府奖图书提名奖，而且在大部分图书畅销外，还打造出一本超级畅销书《改革开放简史》（发行700万册）。其中的多个系列还被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在国外出版，正代表了社长制定的“五化”战略（专业化、精品化、国际化、数字化、大众化）的实施并取得丰硕成果。所以慢有慢的道理，快也有快的好处。

学术出版是文化积累的重要活动，人文和社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和智慧的交流、积累，而出版是记录、传播和交流的一部分，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学术出版在中国有其特殊的使命，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在中国从事学术出版有着多重使命，它的光荣之处不仅在可以为中国的这一建设服务，还可以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为整个人类的文化积累做贡献。但要做好这项事业，就要选择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版更想学的学术研究精品。

什么是学术精品呢？过去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是说有价值的学术作品要经过长久思考、长久积累，才经

得起历史检验，才可能有创造性发现。现在时代和技术发展了，学术活动和知识生产的方式已有很大的变革，一个项目三五年比较常见，也有更短的。虽然说学术成果的质量并不一定与研究所花的时间成正比，但学术活动仍然有其自身的规律，思想智慧的结晶一定是广泛交流和长期积累而成的。所以学术成果炼成的快与慢，也是我们从事出版时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一些时间长而慢的作品，需要编辑长时间的跟踪，而一些作者多、时间短而快的作品需要编辑付出更强的编辑功夫；是否是精品，则考的是编辑的眼光，能否打磨出精品，则需要编辑与作者的良好沟通和共同努力。精品多是较慢的，不能求太快。例如，我社出版的获政府图书奖的《世界佛教通史》（14卷）就是国内外20多位专业学者8年奋战而成，而像去年出版的《白居易资料新编》（10册）、《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殷墟甲骨学大辞典》以及正在分批陆续推出的《今注本二十四史》都是学者们长期思考、长期积累而成，有的是众人几十年的劳动成果。这类作品在出版时，虽然总是在“赶进度”，但其实也应是放慢的，因为精品需要精加工。所谓慢工出细活，用在出版上，还是有道理的。

以上说了那么多快与慢，其实不是经验，是经历；也不是教导，更多的是教训。快与慢的问题更代表着一种思考，学术出版是要快还是要慢？如何快？怎么慢？实话说，今天从事学术出版，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有太多的压力，有太多的挑战。如果不快可能就失去了先机，如果太快可能过后留不下什么；如果慢了，可能对个人来说完不成任务、对集体来说落后于市场。现实似乎是大家都在追求“多快好省”：学者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出最多、最好的成果，出版社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出版更多的图书、出更多的精品，而且最好销售多、成本低、利润高，这都容易理解。但学术出版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多快”未必能“好省”，学术出版是文化积累的一部分，而文化积累恰似一条长河，流速快未必能沉积下什么，急流的浪花虽然壮阔炫目，浪花过后仍然是逝水。我们从事学术出版，当然关注浪花，但更应关注水下的沉积。急流令人兴奋，缓流才能留下东西。在一个以“快”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下，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慢”的价值？学术研究者和学术出版者可能都需要反思这个问题。

或者说，思维要快，选择要慢；该快要快，该慢要慢。毕竟社会发展是“快”的，相对而言，文化积累是“慢”的。学术出版或许当像绅士一样，节奏举止从容一些？

（作者系社科出版社副总编辑）

新时代学术出版的进展与学术编辑的担当

□张晓莉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既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终体现，学术出版在促进学术交流、传播科学知识、推动文化创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后，出版业也出台系列文件、采取相应措施，探索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在此背景下，新时代学术出版取得重大进展，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但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首先，国家加大投入力度，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代表的重大学术工程成果产出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经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大型出版项目推出了一批反映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精品力作，其中近600项成果荣获国家级奖项。这些重大学术工程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现实需要，在经费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重大学术工程的领衔人得以组织研究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学术出版机构得以配备专业编辑团队开展协同作战，从而确保了项目的执行力度与成果的面世速度。这些大型项目中既有阐释时代思想的理论著作，又有展示我们党百年发展历程的主题项目，还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的经典著作，体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与繁荣程度。

其次，重大项目之外，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冷门绝学等前期资助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等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出版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覆盖学科门类较为齐全，选题细化趋势明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代表了我国哲学科学的最高水平，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因对青年学者比较友好，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占绝大部分，对于培养学术研究队伍后备人才、推动新时期各学科领域学术创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再次，随着“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逐步推进，基础学科更为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更为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得到发展，“绝学”冷门学科得到传承，我国学科建设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各学科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科学研究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都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学科基础。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成为重要突破

点。2021年，“交叉学科”成为中国第14个学科门类，“新文科”建设也获得实质性推进，其中“区域国别学”有望成为一级交叉学科的消息令全国近500家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为之一振。区域国别学的兴盛及其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是我国国家和社会进入新时期的需要，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结果。

最后，数字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学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也推动了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据不完全统计，从2016到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数据库项目立项数已接近200项，涉及语言文学、历史文献、民族宗教、新闻传播、考古等学科，建设内容既有文献资料、语言资源的数字化整理与文本挖掘，也有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样本进行的动态分析与指数评估，以及利用结构化关系进行的社会网络分析，极大地丰富了学术研究本身及其方式方法、展现形式。在数字出版蓬勃发展的浪潮下，学术出版领域的数字产品虽不如大众出版、教育出版领域的数字产品受众面广，但数字学术出版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提供专业精准的知识服务、促进学术成果产出、服务学科建设及政策咨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数据库、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经过几年的深耕细作，在业界和学界都享有一定的口碑。

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编辑，面对新时代学术出版的进展与问题，该有怎样的坚守和创新？首先，无论时代怎么变，学术出版专业化的本质始终未变，学术编辑都要在语言文字功底和理论学科素养两方面下功夫。在众多的学术出版物当中，优秀的学术作品毕竟是少数，学术编辑的专业化理念能够将许多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书稿过滤掉，良好的文字修养和较高的学科素养能够帮助作者查漏补缺、纠偏补缺、完善表述，使占绝大多数的“一般性”学术图书质量有所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编辑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该向老一辈的学术型或学者型编辑学习，任何时候都不忘记修炼内功。只有这样，在面对大型出版工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加强对项目成果质量的管控，确保不会发生因个别成果质量不达标而影响整个项目声誉的现象。

其次，主动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关注国内外发展新形势，追踪最新学术前沿，通过提高前期介入的本领和力度，确保后期学术出版的品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类矛盾和问题、风险和困难不断增多的国内新形势，面对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推动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着力提



升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和原始创新的能力。相应地，学术编辑应关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关注青年学者的成长，加强对研究过程的介入，利用自身对相关领域信息掌握较多的优势，通过搭建学术研究平台，创建新的学术品牌，有意识地引导研究机构差异化发展，助力青年学者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

最后，在内容为王的前提下，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学术编辑的大力参与，这是数字学术产品专业性、实用性及可持续性的保障。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新的数字技术的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多数研究者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就研究需求与技术人员进行持续反复的沟通，学术编辑的参与能够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确保研究者的学术需求为技术人员所理解，并在数字产品建设中得以贯彻；学术编辑所具有的专业知识能够确保数字产品的设计符合学术研究的逻辑；学术编辑所具有的学术敏感度能够探知学术研究需求的新变化，进而结合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衍生、建设新的数字学术产品，避免重复建设。

另外，与数字技术发展相关联，学术产品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学术图书的营销推广方式也随之调整。在全媒体的新时代，学术编辑也应积极参与新的营销模式，尝试个性化、多媒介传播，特别是学术社群营销，建立学术生态共同体，借此扩大学术著作的社会影响力，避免大批专业的学术著作滞留在海量的信息社会。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向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致贺信，表明党和国家对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以此为指引，新时代学术出版仍需坚守专业化出版的本质，洞察时代大势，通过不断推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作者系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



如果做一个小调查，问问身边的朋友或邻居，你平时读书吗？若读，都读些什么书？一年会在买书上花费多少？

不用问，答案多半会令人失望。也许是因为职业原因，若去了朋友家或邻居家，我首先关注的是有没有书架？书架上究竟放的是哪些书。毕竟，在我看来，一个人所读之书不仅表现了其文化品位和知识结构，更远一点说，也是其见识的体现。

结果，非常尴尬，很多人家不但没有书架，甚至连像样的书也没有，当然，这样说未免绝对，毕竟考试类、儿童类书籍也是有的。

这无疑更加印证了图书行业是个夕阳产业，纵是天边彤彤一片，但很快归于沉寂和黑暗，而社科领域，更因为对读者的要求高，也就自然而成地成了夕阳产业中的夕阳领域，读者问津者少。

尽管如此，社科编辑依然热情不减，希图将最好的社科书带给最真的读书人，并妄图在改变个人的同时，对时代、社会也能有所助益。

回顾2021年的社科出版领域，总体来说，呈现一种疲软状态，优质社科书尽管比去年有所增加，但与前几年相比，依然大幅减少。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今年有五家出版社（或出版机构）先后都推出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分别是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理想国/中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后浪/九州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汉唐阳光/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作为民营出版机构的佼佼者，汉唐阳光、理想国、后浪都以出版优质的社科书而在读书人当中口碑最佳，三家实力强劲的社科出版大牌同时关注同一作者同一本书，且几乎同时推出，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抛开这本书的版权已经在2020年到期，出版机构不用再大费周折地去考虑版权之事外。这本书本身的优质以及作者的声名，也是原因之一，这本广受赞誉的作品，曾荣获1963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奖（表彰对人文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书籍），1964年希尔曼奖（授予为共同利益而追求社会公正、探讨公共政策的作者），1964年普利策奖（被誉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奖”）。

这本书出版后的一次读书会上，学者刘擎就曾谈，“2020年，美国出版机构打算推出霍夫施塔特四卷本著作。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时序上不是第一卷，但他们先出了这本书。从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又回到了霍夫施塔特少的主题。因为他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提到了‘大众民主跟反智主义的关系’，以及‘民粹跟反智主义的关系’等议题，这是一些反复出现的议题。去年美国有一个学者论坛，该编辑解释了为什么会把这一本先出版出来，当时这位编辑就解释道：《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与当下这个时代有特别大的相关性。”也许，这才是国内一年之内涌现出五个版本的真正原因。

这两年来，社科领域中很多出版社和出版机构都转向古代史领域，也因此，古代史的作品极为繁多，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如青年学者周思成的《曩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

在众多古代王朝中，宋朝格外引人注目，很多读书人心向往之，恨不能生于斯长于斯。

当然，想象与真实的历史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有鉴于此，读者不妨看看宋史学者张邦炜的《两宋王朝史》《宋代的皇亲与政治》，这是学者写给普通大众的通俗读物，“对太祖太宗创建北宋立定规模，真宗仁宗因循守旧，英宗神宗宋旧图新，哲宗绍述熙丰，徽宗钦宗矛盾，高宗偏安东南，孝宗壮志未酬，及南宋后期政治日趋昏暗至亡国等两宋历史诸多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颇为客观、中肯的评价，深入浅出，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宋朝历史读本”（虞云国语）。赵冬梅的《法度与人心》对帝制时期人与制度间的纠葛有很好的梳理。美国宋史研究的佼佼者、已故学者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本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更在于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与价值之所在。”台湾学者陶晋生的《宋代之外》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是了解宋代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绝佳作品。邓小南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则是相对专业、对读者要求更高的一部著作，需要读者花大力气慢慢啃，若能啃得下来，必将受益无穷。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一次偶然中，我发现已故学者陈正祥先生的作品《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还未看书，就被其序言中的献词所深深打动：

谨以此书 纪念伊人
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无端发动疯狂的侵华战争，她绝不会病死在偏僻的深山；如果不是日本兵空前残酷的烧杀淫掠，我不致匆忙离开西子湖边逃难到了松林坡下；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投降，我绝少有机会来台湾进行长期的研究和调查。假如没有这一切，我可能有一极美满的家，以及成群受良好教育的子孙——汉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而现在呢？除了国际地理学界的虚名，我一无所有；所剩下的，唯有回忆、失望、惆怅和哀伤！

伊人，本名何伊人，是陈正祥青梅竹马的女友，受日本侵华之影响，病死于荒山深处，这篇献词情真意切，国恨家仇，跃然纸上，又有一种千帆过尽的苍凉和寂寥，什么名利、什么声望，都抵不过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继承汉文化的儿孙辈。

有这样的至情至性，其文字自然不会枯燥，这也是我们一向对社科书的文字要求，细读之下，果不其然。

再说陈正祥，其“出名”很早，10岁时，游玩雁荡山归来，以一篇《雁荡山游记》为地质学家丁文江瞩目，特意约见，以《徐霞客游记》相赠，勉励向学。同窗游修龄曾回忆：“所有的大小地理考试测验，他都是百分满分，老师干脆让他帮助改考卷。他在小学时，并没有人教他，已经会背记世界各国的国名、首都名、人口数、河流的名称和长度、山脉的名称和高度、物产等枯燥的数字。他向老师所提的地理问题，老师答不出来。”

孔融小时曾机智应对李膺的调侃，“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弄得李膺很没面子，及至千年后，王安石编出了一位方仲永，才为李膺解了围。

陈正祥却不是方仲永，他是孔文举，其后来的成就，连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会长卡尔·特罗尔（Carl Troll）都为之侧目，称其为“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并推崇其为“东方的亚历山大·冯·洪堡”。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一位至今被埋没的大师，我们在寻找其版权继承人时陷入了困顿，纵使找到了陈先生的远亲，又从其远亲找到了其侄女，但依然没有陈正祥先生子女辈的消息。本着好书让更多读者早日读到的愿望，我们无奈只好先行出版，并在版权页特别声明，希望有知情者早日联系我们，以待答谢和支付版权。也借此次机会期盼知情者早日告之，以使我们献上我们最诚挚的谢意。谢谢。

（作者系汉唐阳光总编辑）

二〇二一年社科出版领域的个别现象及其他

□李占哲

